

敦煌壁画中社会象征的分析

张宇航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深圳 518060, 广东, 中国

摘要: 本研究旨在考察敦煌壁画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对壁画主题、元素及其文字内容的深入分析, 研究发现这些艺术作品如何映射出其创作年代所盛行的社会规范与道德价值。本文力图从多学科的立场出发厘清这一视角, 借助艺术史、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洞见, 提供既有理论框架支撑、又有经验证据依托的全新阐释。研究强调: 艺术是政治意志的反映, 构成政治宣传的一种创新性平台, 由此展现出艺术、权力运作与社会结构之间深刻的关联与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 敦煌壁画; 壁画主题; 社会治理

The Pictorial Saga of Social Control: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ymbolism in Dunhuang Murals

YuHang Z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role of Dunhuang murals as a tool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rol. By conducting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themes, elements, and textual content of the murals, the study findings revealed how these artworks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ideologies, social norms, and moral values prevalent during their cre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is perspective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standpoint, drawing upon insights from art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to provide fresh interpretations grounded in bot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e research underscores that art serves as a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will, engages in a dynamic interplay with social control, and serves as an innovative platform for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reby demonstrating a profound interconnection and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power dynamics, and societal structures.

Keywords: Dunhuang murals; Mural themes; Social governance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敦煌壁画是敦煌美学领域中艺术表达的具体呈现, 展现了艺术、政治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些壁画不仅具有宗教价值与审美价值, 也生动地折射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

（二）研究目的

敦煌壁画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笔者将其大致归为三类：壁画研究、壁画保护与艺术衍生。在壁画研究领域，众多学者对单幅或多幅敦煌壁画展开了深入剖析，探讨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审美品格、哲学与宗教思想，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映照。在壁画保护方面，研究者结合生物化学知识，破解敦煌壁画的制作工艺与材料选择，提出富有创见的保护方法，为敦煌壁画的有效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艺术衍生领域，学者们从壁画中提炼审美元素与符号，将其融入舞蹈、油画、当代陶瓷壁画、综合材料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并与女装设计、家具设计、电子游戏等现代场景相结合，推动了跨学科的文化创意设计。尽管众多学者为敦煌壁画研究的全面发展付出了努力，但从政治学与社会学视角展开的探索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着力构建跨学科的理论对话平台，尝试从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维度切入，依托敦煌壁画这一丰富的历史样本，深度解码艺术与政治生态的耦合关系。本文尤其关注艺术在政治意象表达、社会秩序维系及政治动员方式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力求通过这一视角转换，激活敦煌文化遗产的当代社会意义，为其学术价值谱系增添全新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注脚。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融合艺术史、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敦煌壁画，探讨其社会层面的意涵。

二、敦煌壁画中的政治与社会象征

（一）壁画主题与当时政治环境的关联

敦煌壁画生动地描绘了极为广泛的题材，包括佛教故事与传承、神话传说与神祇崇拜、历史人物、人物肖像、音乐与舞蹈，以及日常生活与民俗风情。这些精细的描绘与敦煌地区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敦煌在隋唐时期臻于繁盛，恰与佛教盛行的时段相重合。佛教的传入深刻影响了壁画所表现的主题与风格。与此同时，隋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生机勃勃的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俱臻繁荣。在这一背景下，中央集权而强盛的统治为敦煌壁画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动力。壁画中的部分内容由政府或寺院出资绘制，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意在彰显统治者的权威、国家的富庶以及佛教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借以强化统治阶层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敦煌的壁画长卷提供了一幅精妙的图景，凝聚着诸多母题：帝王之权威、神话之神秘、传奇人物之英勇。

1. 关于帝王之权威

在敦煌壁画所覆盖的洞窟壁面上，对帝王统治的描摹往往通过与佛教故事相交织的画面加以呈现，其典型即“转轮圣王”或“佛之化身”一类形象。“转轮圣王”勾勒的是这样一种世俗君主的原型：其统治带来和谐与富足。这一形象见于多铺壁画，如莫高窟第45窟著名的“转轮王像”，其相貌威严而慈悲，身着华美衣饰，映射出帝王崇高的地位与权柄。这些视觉叙事同时表述了帝王的双重角色：既是佛法的护持者，又是宗教德性的典范。

2. 关于神话之神秘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神话与皇权的关系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神话为皇权提供了神圣的象征意义，而皇权则借助神话强化对社会的统治。敦煌莫高窟中描绘尸毗王本生故事的壁画即是典型一例。

尸毗王本生讲述了他割肉贸鸽、以己身之肉满足鹰之所求的无私之举。这一故事体现了佛陀对众生的慈爱与悲悯，以及对生命神圣性的敬重。尸毗王的行为感天动地，最终获得佛法的加被，身体得以复原。这种牺牲精神与对佛法的坚定信仰，为皇权提供了神圣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古代，皇帝被视为“天子”，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借助尸毗王本生这类神话故事宣扬自身的

神圣地位，以及对国家与百姓的关怀。通过把自己比附于尸毗王这样的神话人物，帝王试图使民众相信：其权力乃神授，且自身具备独特的神性品质。

此外，尸毗王本生也强调了牺牲精神与道德准则。帝王通过传播此类故事强化社会道德教化，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他们力图使人们相信：唯有恪守道德准则、效法尸毗王一类神话人物的行为，方能获得佛法的护佑。

因此，莫高窟中尸毗王本生壁画的存在，既反映了佛教的教义与精神，也凸显了神话与皇权之间的关联，以及皇权如何借助神话资源强化社会治理与统治合法性。这些壁画作品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与文化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古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史料。

3. 关于传奇人物之英勇

英雄的英勇事迹构成敦煌壁画中另一个突出的主题。这些描绘凸显了历史典范人物的卓越才具、高尚品格与重大功业。例如，莫高窟第 323 窟中对汉代名将张骞出使一节的表现，人物披挂戎装，气度无畏，象征着国家的坚强与边疆的稳固。此类艺术呈现既是对前代英杰的礼敬，也凝聚着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

这些精妙艺术表达的产生及其叙事内容的取舍，不仅映照出工匠的巧思与心愿，也凝结着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信念、伦理标尺与治国叙事。创作者以娴熟的图像语法与寓意手法，使壁画超越单纯的审美对象，成为传播政治与社会准则的有力渠道。壁画由此转化为社会调控的有效工具。

总体而言，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寓意性呈现深入探讨了君主治理、神话传统与英勇卓绝这三重母题。通过拆解并释读这些视觉文本，我们既能更细致地理解古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又能同时辨识出王朝权力借助美术实施意识形态引导与社会治理的手法。此类学术探讨为我们思考当代政治运作、思考其借助文化产品塑造社会世界观的倾向提供了一个视角。作为一面史学的透镜，敦煌壁画折射出人类社会演进的复杂谱系，以及隐含于其绚烂图景之中的潜在政治意图。

（二）宗教象征：佛教教义与政治权力的交汇

宗教本身即是一种由权力关系所形塑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根本之处在于依据神圣界与人间界之间的等级结构以及人际互动而建构起权力关系。因此可以说，宗教天然地与权力相交织，具有内在的权力属性。

佛教教义与政治权威的结合，意在借助宗教教义的神圣性来强化世俗统治。在敦煌壁画中，这一融合通过对佛教圣者及其故事的描绘得以体现。佛陀的生平、菩萨的慈悲精神、罗汉的智慧，均被用以传达一种社会和谐安宁的理想状态。在这一语境中，宗教不仅是个人的精神修行之路，同时也是统治者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例如，莫高窟壁画中频频出现释迦牟尼的形象，其旁伴以众多菩萨与罗汉，头光环绕、相貌庄严，呈现出超越尘俗、象征至高权威的崇高形象。这些图像强化了君主与佛教义理之间的联系，暗示帝王乃佛陀在世俗中的化身，受神圣之权柄以治国安民。

此外，壁画对佛教叙事所作的政治性阐释表明，许多故事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与权力格局的隐喻。例如，某些壁画描绘救度苦厄、克服危难的故事，既折射出佛教慈悲济世的理想，也象征着统治者所欲塑造的仁慈而睿智的形象。

（三）社会规范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家庭、社会等级与法律

敦煌壁画同样凝聚着与家庭、社会等级和法律相关的社会规范与道德价值。这些绘画不仅是宗教的表达，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细致的场景描绘，它们映射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规范，培育着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与道德标准 [1]。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壁画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一些壁画描绘家庭场景，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与孝道观念。这些画面强调家庭和睦、尊卑有序、男性主导等传统价值，传递出社会秩序稳定与尊重

传统的信息。

社会等级也是壁画中一个显著的主题。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以不同的尺度与装饰加以表现，以反映其社会身份。这既映照出社会的分层结构，也强化了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通过强调尊卑之序，壁画传递出维护社会稳定、尊重社会规范的讯息。

法律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关键工具，在敦煌壁画中同样有所体现。某些场景可能暗指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些描绘有助于强化人们对法律的遵从与认知，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综上所述，古代统治阶层通过神化帝王与颂扬典范人物的方式，将政治权威与道德理想深植于民众意识之中，以培育对统治者的忠诚及对社会楷模的敬仰 [2]。君权神授观念兼具权威性与神圣性，有助于强化民众对统治秩序的认同与遵从。所谓“英雄”乃效忠王室的典范，而对英雄人物的仰慕则为社会成员确立了行为参照，引导其自觉恪守社会规范，并激励其效法这些典范人物。笔者在此并非要批评古代英雄，而是意在揭示寻常描绘与宣传中所隐含的社会治理。越过中世纪的神权统治而聚焦于中国，宗教成为世俗治理的工具：世俗君主可借助精神信仰赋予自身合法性，维系王朝统治 [3]。宗教为社会下层提供了心理上的庇护所，为生活的苦难提供了解释。与此同时，制度、法律、家庭与社会结构不仅塑造了民众行为的规范与参照，为其行动提供了可预期的后果，也传递着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根基，界定何为是、何为非，而这与统治精英的意旨与标准紧密相连。究其根本，一切形式的权力都在塑造观念、认知与偏好。行使这种权力的掌权者能够使被统治者的从属地位显得自然而然，或使其相信别无选择，从而在价值观、心理认知与行为模式上接受既定的安排。这种文化整合机制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定位与利益评判，在维系社会稳定的同时，亦深刻作用于群体意识的形成。敦煌艺术与政治权威的交织，恰为上述社会调控逻辑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四）有待进一步创新与探讨的方面

在创新点与亮点方面，笔者认为以下视角可以进一步深化分析。

第一，互动性分析：分析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与观者之间的视觉互动，探讨艺术如何通过视觉传播影响并塑造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与行为方式 [4]。这一分析旨在从传播社会学层面，细化考察艺术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路径。

第二，文化融合视角：考察敦煌壁画中佛教、道教、儒家等多元文化要素的融汇，分析不同文化体系在艺术场域中如何相互对话、彼此涵化，并最终共同作用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此部分致力于揭示艺术作为文明同化媒介，在促进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方面的重要功能。

第三，性别视角：本文借鉴性别研究的相关理论资源，系统分析敦煌壁画中男性与女性角色的图像呈现方式，探讨艺术文本如何参与并反映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过程。研究旨在揭示壁画所承载的性别规范与道德价值体系，进而理解艺术在维系传统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潜在作用。

第四，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深入探讨敦煌壁画中法律与宗教如何彼此影响，法律如何借宗教教义得以强化，宗教又如何通过法律的执行获得社会合法性。由此，本文旨在阐明宗教与法律有机结合、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理解传统中国的治理智慧提供艺术维度的补充 [5]。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的学术价值已超越单纯的艺术鉴赏范畴，而升华为理解传统社会运行逻辑的重要史料。本文的多维度考察表明，宗教意象、权力话语、伦理规范与性别观念在壁画场域中相互交织，共同参与了古代社会意义体系的建构与维系。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更可为探讨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典型的历史样本与理论参照。

三、具体案例分析

（一）莫高窟第 12 窟“华严三圣”壁画

莫高窟第 12 窟的“华严三圣”壁画，是一铺映射华严宗教义与皇权合法性之关系的敦煌壁画。在分析这铺壁画时，笔者将从佛教教义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入手，探讨其所承载的象征意涵及其对理想治理的隐喻。

1. 佛教教义与政治权力的结合

华严宗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唐代澄观所倡“三圣圆融”之说影响深远。依此教义，“法法相即”，在菩萨的修行之中，因与果、方便与究竟、解与行、智与慧彼此圆融。明此理者，念念即因，念念即果；依此而行，必得三圣之德。

此外，华严宗强调宇宙与众生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存 [6]。在敦煌壁画中，这一思想体现于对众多佛与菩萨的描绘之中。他们往往以庄严和谐的姿态出现，象征着华严宗所强调的宇宙和谐与统一。帝王被视为受命于天者，负有维护国家与社会秩序之责，其统治意在实现天下的和谐安定，与华严宗的世界观自然相合 [7]。

2. “华严三圣”壁画的象征意义

莫高窟第 12 窟的主体壁画描绘了华严宗的主要菩萨：文殊、普贤与观音。这三位菩萨分别代表智慧、行愿与慈悲，即华严教义所倡导的主要德性。

文殊代表智慧，通常骑狮持宝剑，象征以智慧破除无明（即无知与迷惑）。在壁画的隐喻中，文殊的智慧象征帝王以智治国的理念，表明帝王凭借智慧与明辨来治理国家 [8]。

普贤代表行与愿，骑象而现，象征其坚定而清净的行持。普贤积极进取的精神映照出帝王的功业与建设，寓意帝王应积极行善，以利国利民。

观音象征慈悲与救苦，以慈祥悲悯的形象呈现，常与水、月等清凉之物相关联。观音的慈悲象征帝王对臣民的关怀，表明理想的统治者应具备的仁德与以民为本的品格。

3. 壁画与皇权合法性的关系

壁画中的象征意涵强化了帝王统治的合法性与理想化形象。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把佛教菩萨的形象与皇权相连结，不仅提升了帝王的道德形象，也契合佛教教义中广为传布的慈悲与智慧的理想。帝王被描绘为菩萨一般的存在，凸显其在维护社会和谐与秩序方面的神圣角色与权威地位。

笔者以“华严三圣”为个案，揭示敦煌壁画如何以艺术方式呈现佛教教义与皇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这种象征性的绘画不仅在视觉上展示了华严宗的核心教义，也在政治层面强化了帝王作为理想统治者的形象，从而传递出社会治理的信息。这既反映出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彰显出其在社会与政治领域中的功能与意义。

（二）莫高窟第 57 窟“千佛变”壁画

莫高窟第 57 窟的“千佛变”壁画是一铺著名的敦煌艺术作品，被视为皇权神圣化的重要表征。在分析这一主题时，笔者聚焦于佛像形象的多样性与庄严性，以探讨它们如何折射出对皇权的敬畏。

1. 佛像形象的多样性

“千佛变”中的佛像形态丰富多样，每一尊都有其独特的姿态、表情与装饰，构成一个宏阔而复杂的宗教与象征世界。这种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映照出皇权的全面性与普遍性。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被赋予多重角色与职责，涵盖军事、宗教、法律与文化等诸方面。佛像形象的多样性可以被视为帝王多重职能的象征，反映出其在不同领域中的智慧与能力。

2. 佛像形象的庄严性

壁画中的佛像以庄严肃穆、威仪堂堂的形态呈现，映射出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同样，皇权也需

要这种庄重威严的形象来维系其尊严与权威。通过佛像的庄严性，壁画传达出对帝王的敬畏与崇敬，暗示帝王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在此，佛教的神圣性被转移至皇权之上，强化了统治者合法性的宗教根基。

3. 对皇权的敬畏与神圣化

在这些壁画中，佛像常被置于中心位置，四周环绕菩萨、罗汉、天王等宗教人物，进一步凸显佛的中心地位，与帝王在国家与社会中的核心角色相对应。此外，壁画中的佛像通常处于说法的情境之中，他们并非静态的装饰，而是被赋予弘扬佛法、导人向善的使命。这与帝王的角色颇为相似：帝王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同时也是文化与道德的引领者。

总体而言，佛像形象的多样性象征帝王的多重职能，而其庄严性则代表帝王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种艺术表现既传达出佛教信仰对皇权的支撑，也折射出皇权借助宗教象征巩固自身合法性与权威的策略。这一例证说明，敦煌壁画对于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皇权运作具有深层的意涵。

四、敦煌壁画与当代社会治理的关联

敦煌壁画的象征意涵在今日语境中被理解与运用，不仅体现于文化遗产与艺术创作之中，也为当代社会治理的语境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文化遗产与国家认同建构

首先，敦煌壁画的象征意涵被用以强化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壁画中反复出现的佛教故事、道教神仙与儒家经典，在当代中国被重新阐释，成为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来源。壁画元素常被用于公共艺术装饰与建筑设计，赋予公共空间以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化的厚度。此外，政府与文化机构对敦煌壁画的推广与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理解，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有助于国家稳定与共同身份的认同。

（二）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

现代艺术家、设计师与电影人常在创作过程中从敦煌壁画的象征意涵中汲取灵感。壁画中服饰、色彩与人物姿态等精细的细节，在现代设计与视觉艺术中被再现与再创造。这不仅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焕发生机，也为现代艺术提供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表达。作为一种媒介，艺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传播力与深远的感染力，通过绘画、音乐、戏剧等多种载体传递不同类型的文化信息，传达情感、价值观与思想观念，使人们对文化本身获得更深的理解，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影响人们的观念与行为，进而改变社会面貌与文化氛围——这正是艺术在政治宣传中的创新性运用。今天，艺术仍被用作传播政治理念、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公民爱国热忱的手段。通过分析敦煌壁画的历史用途，我们能够更好地体察艺术在政治传播中的潜在力量，这对于提升现代政治宣传的艺术性与感染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教育传播与社会价值观塑造

敦煌壁画中的象征意涵在教育中，尤其是在历史教育与道德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者通过讲解壁画所描绘的神话故事与历史事件，向学生传授传统文化知识与社会价值观。壁画提供了了解过往宗教信仰、社会等级与日常生活的窗口，成为沟通历史与当下的桥梁。它们有助于年轻一代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对社会规范的理解。壁画中人物的行为与位置，如君主与臣属的关系，折射出包括君主至高权威在内的传统观念。

其中一铺题为“佛教十王经变”的壁画，展现了君主与臣属共同参与诵经的场景，显示出他们对传统信仰的深切敬重。君主被置于画面中心，臣属环绕四周，凸显了儒家经典所描述的君主的绝对权力。另一铺名为“释迦牟尼说法图”的敦煌壁画，则描绘释迦牟尼讲经说法、虔诚的官员与僧侣凝神聆听的情景。画中人物唤起人们对宗教神话与故事的向往，象征着对佛陀教诲的敬重与追念。

“涅槃经变”是一铺描绘释迦牟尼涅槃、凸显“般涅槃”即最终解脱之义的壁画。不过，第322窟的壁画又融入了佛陀从金棺中起身为母说法的故事，强调了封建社会中孝道的重要性。这一故事描绘佛陀由金棺中起身向母亲致敬、开示众生。壁画突出了孝道的意义，反映出佛教教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

这些壁画出现于武则天当政时期，其时儒佛之间冲突不断。唐代见证了这两种信仰体系之间的重大论争，而论争往往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儒家士人批评佛教有悖忠孝、不合华夏文教。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被置于儒学之上，由此招致儒家士人的抵制。作为回应，佛教不得不适应中国的语境，将某些儒家道德标准纳入佛教教义之中，此即所谓中国化的过程。第322窟的“涅槃经变”壁画正是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

“涅槃经变”不仅传布佛教教义，也强调儒家的孝道价值，因而成为道德教化的一种途径。这体现出佛教的包容特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四）当代社会治理的隐喻与反思

在当代社会治理的语境中，敦煌壁画的象征意涵为反思信息时代的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隐喻。今日高度发达的社交媒体与大众传媒，与敦煌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壁画作为当时社会治理与价值传播的重要渠道，其视觉传播与思想引导的手法与策略，与现代媒介颇为相似。通过对壁画象征意涵的深入分析，我们能够提炼出现代社会中有效传播与价值引导的策略。

（五）创新视角

敦煌壁画的象征意涵在今天还可以从以下创新视角加以理解与运用。

第一，数字复原与虚拟现实技术：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以更直观、更具互动性的方式向公众呈现敦煌壁画的象征意涵，从而延展并深化其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功能。

第二，跨文化交流的媒介：通过敦煌壁画的国际展览与研究，使其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全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交流。

第三，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把壁画的象征意涵与现代心理学理论相结合，探讨图像如何作用于人的心理与情感，并有望应用于广告、品牌与心理治疗等领域。

第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壁画中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及其所呈现的和谐共生理念，可以为现代社会倡导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提供视觉素材与思想资源。

五、现代媒介与传统壁画的比较分析

（一）差异与共性

在将敦煌壁画与现代媒介同作为社会传播载体加以比较时，二者在机制与语境上的区别便显现出来。壁画植根于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作为道德与宗教教化的显性媒介，借助对超自然力量与因果报应的信仰来引导行为规范。相较之下，现代媒介运行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中，通过信息的传播与商品的推介塑造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施行一种更为隐蔽而多元的引导方式。壁画强调直接的道德指引与宗教戒律，现代媒介则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运作，参与公共话语、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的形塑。然而，二者在对社会成员施加引导与影响这一目标上是共通的，只不过借助不同的符号与叙事形式，折射出各自历史文化语境中社会权力结构与价值体系的复杂性。

敦煌壁画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典范，其最著名者见于莫高窟。这些壁画不仅呈现宗教艺术，也映照出古代社会的伦理观念与社会整合机制。例如，“轮回图”表现业报与六道轮回的观念，展示了佛教教义如何被用以引导人的行为。这一表征既是宗教信仰的反映，也是统治阶层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壁画传递出一种权威性

的道德讯息：个体应恪守特定的行为规范，否则将面临不利的轮回果报。这种宗教与伦理的教化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借助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与对未来业报的敬畏来规约行为。

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语境中，现代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也是商品与生活方式的推手。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它们借助算法推送特定内容，塑造用户的信息消费与行为习惯。这一设计能够影响公共话语、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一种隐性的社会引导机制。

敦煌壁画的历史语境是中国古代，尤其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其主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是道德教化与宗教信仰。相形之下，现代媒介置身于信息时代，信息生成与传播的速度远超以往任何时代。广告、电视、电影与社交网络等媒介渠道塑造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把个体引向物质追求与个人成功。这种社会引导形式在道德教化上虽不如古代壁画那样直接，却通过制造趋同的消费欲望与生活方式，间接地影响着行为与思想。

从敦煌壁画到现代媒介，社会引导方式的演变折射出社会组织形态的转型。传统社会强调集体与整体的稳定，个体通过统一的宗教与道德教化获得社会身份。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强调个体主义与多元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引导的消失；毋宁说，它表现为一种更为隐蔽而复杂的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消费文化与价值渗透加以实现。总之，敦煌壁画与现代媒介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都以不同的符号与叙事形式对社会成员施行引导与影响。敦煌壁画所施加的社会引导更为直接、更为显性，强调道德规范与宗教戒律；现代媒介的引导则更为隐微而多元，通过塑造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实现影响，映射出社会权力结构与价值体系的复杂性。

（二）内容创作与传播

在内容创作与传播方面，现代媒介通常涉及更多的个人与组织，内容也更为多元。相较之下，壁画的创作一般由少数艺术家完成，内容更为统一，也更具权威性。

（三）受众参与

在受众参与的层面，现代媒介提供了互动性与参与性，而壁画则是受众的单向接受。不过，二者在传递社会治理信息方面同样存在共性。现代媒介与传统壁画都可能受到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影响，折射出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二者也都可以充当宣传工具，塑造并强化社会规范与行为准则。

六、结论

（一）敦煌壁画社会功能的总结

敦煌壁画在艺术表现与价值传播层面展现出高度的融合性，将政治讯息的传递与道德教化有机融为一体。对其展开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既为当代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艺术资源，也为理解艺术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提供了历史洞见，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古代艺术与政治社会动态之关联的认识。

（二）本研究的贡献与学术价值

本研究以跨学科的路径系统考察了敦煌壁画所承载的多重社会功能，为分析文化产物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艺术在塑造社会价值体系方面的作用，并为当代社会治理与文化遗产提供了历史层面的参照与启示。

（三）对敦煌壁画未来研究的建议

本研究倡导跨学科的协作，以探讨敦煌壁画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促成全面的理解与知识的整合。研究旨在深化关于艺术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认识，凸显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在不同文化中的影响。此外，对原始史料的深入梳理与考订，并结合田野考察，将有助于重建其社会历史语境，探究特定历史条件下壁画创作的社会动因与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 [1] 杨海鹏. 渤海陶塑千佛初探. 北方文物, 2024(01): 95.
- [2] 解然. 宗教、权力与身体: 福柯的宗教理论述评. 学理论, 2018(09): 105-106.
- [3] Wong D C. Dynamics of Interregional Exchange in East Asian Buddhist Art, 5th-13th Century. Wilmington: Vernon Press, 2022.
- [4] 罗润玉. 彩绘佛像事略——乾隆御笔佛传图考. 西藏研究, 2021: 25-29.
- [5] Wong D C. Buddhist Pilgrim-Monks as Agents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ans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Art Style in East Asia, ca. 645-770.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8.
- [6] 赵声良, 久野美树. 十年来日本的中国佛教美术研究综述. 敦煌研究, 2004(4): 100-106.
- [7] Högger R. Presents for Buddha: The Meaning of the Eight Auspicious Symbols in Tibetan Buddhism. Dowling J, Schintu A, trans. Kathmandu: Vajra Books; Rikon: Tibet Institute Rikon, 2019.
- [8] Choi S E. A Study on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the Balhae Capital: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East Asian Buddhist Sculptures. Journal of Art History, 2005(19): 131-165.